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社会小说

SHEHUI XIAOSHUO

茅盾

上海文艺出版社

95838

I247.7
162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茅 盾
社会小说

叶子铭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 施浩祥

封面设计: 陆震伟

插图: 魏忠善

茅盾 社会小说

叶子铭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插页 5 字数 122,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5次印刷

印数: 25,001—30,500 册

ISBN 7-5321-1030-3/I·761 定价: 10.50 元



作 者 像



作者部分作品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序

叶子铭

1927年，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里说：“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在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里，多少行列已被歼灭：战争开了一个窟窿，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了踪影。”^①二十世纪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在深重的灾难中奋起变革的伟大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种种劫难，无数先驱者和优秀儿女，运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武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现代化，为创造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前仆后继。翻开本世纪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披荆斩棘、拓

^① 《贝多芬传》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111页，

路开荒，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献出毕生心血的先驱者和著名作家，除少数健在者外，如今大多数已相继离世而去。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将离开我们越来越远。然而，从他们留下的作品中，我们却能强烈地感受到本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与人生百态，倾听到古老民族苏醒后在火与剑的熔炼中毅然前行的脚步声，领略到各种风格流派的文学作品的独特风采。

从这个角度看，当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末尾的时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的计划，就显得颇有眼光。因为，无论从为读者阅读现代名家名作提供方便，还是从沟通昨日与今日，乃至昨日与明日的人们之间的历史的与感情的联系看，这都是件很有价值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当出版社的编辑邀我为先期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部分选编一本茅盾短篇小说专集时，我欣然从命了。

茅盾属于为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拓路奠基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小说家。他原名沈德鸿(1896—1981)，字雁冰，浙江桐乡县乌镇人。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他毕生从事过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在新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和外国文学的译介等方面，都作出过开拓性的重要贡献，可谓是一个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在他多方面的文学业绩中，尤以小说创作的成就与贡献最为突出，影响也最

大。茅盾这个名字，就是1927年9月他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說《幻灭》时所使用的笔名。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茅盾不仅以创作《蚀》三部曲、《虹》、《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一系列著名的中长篇小说而闻名于世，而且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画廊里，占有一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从1928年4月发表第一个短篇《创造》起，到1949年1月发表最后一个短篇《春天》止，他一生共写了五十四个短篇。数量虽不多，流传却很广。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至今，他所写的短篇，曾先后编入《野蔷薇》、《宿莽》、《春蚕》、《茅盾短篇小说集》（一集、二集，开明书店版）、《泡沫》、《烟云集》、《耶稣之死》、《委屈》以及《茅盾短篇小说集》（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十余种集子里，在广大读者中广泛流传。这里编选的《喜剧》、《小巫》、《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当铺前》、《大鼻子的故事》等八个短篇，发表于1931至1936年间，是茅盾写于三十年代前期的一批优秀的社会小说。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茅盾的五十多篇作品中，集中选编他写于三十年代的作品呢？说来道理很简单，茅盾早期虽写过一批有鲜明的心理剖析倾向的短篇，抗战以后也写过许多反映抗战时期社会现实与知识分子心态的作品，但最能体现茅盾短篇创作的艺术特色与思想艺术成就，最能体现他“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与审美追求，同时也是在国内

外读者中最具广泛影响力的短篇，当首推他写于三十年代前期的一批以江南城乡社会人生为描写对象的社会小说。这里所选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的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茅盾是以重视小说创作的社会性与时代性著称的。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他在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时就说过：“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他们描写的虽只是一二人、一二家，而他们在描写之前所研究的一定是全社会、全民族。”^①他的这种文学主张与艺术追求，在他进入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成熟期时，得到了最充分和最成功的体现。以长篇《子夜》和短篇《林家铺子》、《春蚕》等为代表的系列作品中，茅盾以历史画卷式的艺术画面和现实主义的精细描写，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初旧中国都市、乡镇、农村的社会面貌和各阶级、阶层人物的命运，并因此获得国内外读者与评论界的广泛赞誉。早在1933年，小说家吴组缃就说过：“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他的最大特点便是在此。”^②当时，还有人拿茅盾和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相比，说“中国之

①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原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期。

② 吴组缃：《子夜》《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6月1日。

有茅盾，犹如美国之有辛克莱”。我们知道，辛克莱是以创作揭露本世纪初叶美国社会黑暗面的《屠场》、《煤炭大王》（即《石炭王》）、《煤油》、《波士顿》等长篇小说而闻名于世的。对于这种比喻，瞿秋白曾有中肯的评论。他说：“人家拿作者来比美国的辛克莱，这在大规模表现社会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风，拿《子夜》以及《虹》、《蚀》等来比《石炭王》、《煤油》、《波士顿》，特别是《屠场》，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截然不同点来，一个是用排山倒海的宣传家方法（按：这里是指辛克莱），一个却是用娓娓动人的叙述者的态度。”^① 这就是说，茅盾小说创作的社会性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就被评论界所认识。有人之所以把他和辛克莱相比，其主要依据也在此。而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子夜》等中长篇小说中，也同样体现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中。

捷克斯洛伐克的已故著名汉学家、布拉格学派的核心人物普实克教授也说过：“茅盾努力捕捉和表现现实的尝试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重视。在世界上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有像茅盾那样的一贯紧密地与当时的现实以及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件联系起来。”^② 他甚至把茅盾比作外科医生，说“他以坚定的手和准确无误的眼睛对社会结构进行解剖，暴露出所有侵蚀社会肌体的疾病”^③。近些

① 施蒂而（瞿秋白）：《读子夜》《中华日报》1933年8月13、14日。

②③ 《茅盾和郁达夫》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48页。

年来,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时,有人则进一步把茅盾视为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开创者^①。从茅盾三十年代的一些优秀短篇和《子夜》的创作实践看,这种看法是无道理的。

1932年茅盾在《我的回顾》一文里曾说过:《小巫》和《林家铺子》是他小说创作题材重要转换的开始,“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这里所说的“最初铸定的形式”,指以《野蔷薇》等为代表的早期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格调。作者写于大革命失败后到左联前夕的短篇,除《泥泞》外,均取材于“五四”至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技巧上注重以心理剖析的手法,细腻地刻画革命浪潮中知识青年的彷徨苦闷心理和悲观消极情绪。从艺术上看,它们更接近于心理剖析小说。茅盾本人对自己早期的短篇一直不太满意,他还曾用想摆脱“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宿莽·弁言》),“我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答国际文学社问》),“我在努力挣扎,想从我自己所造成的壳子里钻出来”(《茅盾文集》第七卷后记)等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努力寻求实现创作上新突破的心情。作者写于三十年

① 参见严家尘:《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代的一批优秀的社会小说，就是他实现这种突破的重要标志与成果。

这里选编的八个短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较早也较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三十年代前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借助自幼对江南乡镇人生的感性经验，以及“一二八”上海抗战后两度回故乡乌镇的直接观察与感受，从各个不同侧面相当集中地描绘了半个多世纪前旧中国城镇、农村的社会面貌。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经济萧条与政治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军阀混战，民族工商业的破产与工农群众的赤贫化，以及“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象等，已使中国社会处于灾难性的边缘。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在茅盾三十年代的社会小说中得到相当真实而生动的表现。

《小巫》和《林家铺子》是他首次描写乡村小镇社会人生的短篇。《小巫》以一个受凌辱的女性——菱姐的遭遇与见闻为线索，用简练巧妙的笔法，描写江南小镇土豪家庭内部老爷与姑爷之间为贩卖烟土与争夺团董位置而展开的内讧，以及小镇上各种势力为转移矛盾以民为匪、鱼肉百姓的行径。这个横行乡里的土豪家庭，最终被奋起反抗的农民葬身于火海之中。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三十年代初乡镇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化。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林

家铺子》，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精明能干而小心谨慎的小商人林老板的典型形象，并通过他从苦心经营到被迫破产出走的悲剧命运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初期江南城镇小商人的处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十年代初经济萧条与政治腐败给民族工商业和乡镇小商人带来的灾难。

紧接着作者又把视线转向江南农村，接连发表了《春蚕》、《秋收》、《残冬》（后来被评论家合称为农村三部曲）三个短篇。小说通过一个典型的江南农家——老通宝及其子孙们勤奋劳动最后却家破人亡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一二·八”事变前后江南农村经济的破产和蚕农们的悲剧命运，同时也表现多多头等新一代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其中，特别是《春蚕》对三十年代初丰收成灾这一畸形社会现象及其内外根源的形象揭示，以及老通宝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与江南农村习俗的描写，最为世人所称道。继《春蚕》之后，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夏征农的《禾场上》等，对当时农村丰收成灾的现象，也作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描写。稍后的《当铺前》，用近乎速写的笔法，借贫苦农民王阿大上当铺的见闻与朝奉先生的冷冰冰态度，描写拥挤在当铺前的一群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赤贫农民的群像。以上的几个短篇，均发表于《子夜》写作的过程中或刚出版之后，实际上是《子夜》原写作计划的组成部分，这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些短篇，不仅和《子夜》一起成为作者三十年代社会小说的主要代表作，而且也成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

展史上的名篇，多次被选入大中学的语文教材。其中，《林家铺子》与《春蚕》还被改编为电影，并且以英、俄、法、日、斯洛伐克等多种文字翻译介绍到国外去。

《喜剧》与《大鼻子的故事》，是两个比较特别的短篇。《喜剧》实际上是篇社会讽刺小说。作者运用“大题小做”与对比讽喻的手法，描写国民党员青年华因大革命时期散发反对封建军阀孙传芳的传单被捕入狱，五年后刑满出狱后，他发现“革命”成功了，自己却不仅过着忍饥挨饿到处遭白眼的日子，而且又被当作“在逃共产党”再度送入捕房。理由是孙传芳时代敢于上街散传单的，不是共产党是什么？最后经一番波折，他偶然遇上已当了官的昔年同学金，得到的指点依然是要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主动自首，因此乃可以解决生活与工作问题的捷径。小说还通过穿蓝短衫的买烧饼的工人直率的语言：“革命！革命！吃的穿的都革贵了！他妈的革命！”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大鼻子的故事》则把目光投射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浪儿童身上。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一座拥有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然而其中却包含着三四十万的童工，以及无数比童工的生活还不如的街头流浪儿，人称上海小瘪三。这些受人歧视的小人物却引起作者的关注，他以充满人道主义的同情与细腻的笔调，着意刻画了一个流浪儿童大鼻子的形象。“一二八”上海战争中，日本侵略军炸毁了贫民窟，使他失去了双亲，也失去了家，成为流浪街头的上海小瘪三。为了生

存,他与野狗争食,露宿街头,并沾染上骗、偷、赖等恶习。然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依然保持着纯朴的是非爱憎观念,当他偶然被卷入学生们的爱国示威游行的行列时,他脑海里马上排出一个公式:自己常挨巡捕打,现在学生也被打,所以他们是好人。“好人要帮好人。”于是,他不仅将游行学生掉在地上的钱袋,以熟练敏捷的身手送回学生的口袋,而且也捡起旗子精神抖擞地跟定游行队伍往前进。作者通过这篇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小说,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三十年代都市社会生活的一角。

茅盾社会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与表现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作者曾经说过,“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而现实中的人总要与各式各样的人发生关系,因此作家要写人,就不能孤立地去观察表现人,犹如不能把一片树叶从枝头摘下来照样描一样,因那是写不出活的具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来的。^①同样的,他主张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从各个侧面进行深入全面的观察。他说,“观察一特定生活,必须从社会的总的联带关系上作全面的考察”^②;“对于全面茫无所知,就不了解深入一角:这是我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所得到的一点经验教训。”^③这样,作者描写的虽不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现象,他却能从中透

① 茅盾:《谈我的研究》 见《茅盾论创作》第24—25页。

② 茅盾:《创作的准备》 见《茅盾论创作》第462页。

③ 茅盾:《茅盾选集·自序》 见《茅盾论创作》第22页。

示出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把《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当铺前》等短篇，同写于同一时期的《子夜》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林老板、老通宝、王阿大与吴荪甫等人物之间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十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与帝国主义势力对民族工业的渗透与控制，加上国内政局的动荡与腐败，使雄心勃勃的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计划化为泡影。而吴荪甫们的丝厂倒闭了，以养蚕为主要副业的老通宝一家的“蚕花”再好，“雪白发光”的上好茧子还是难以卖出去；千百万老通宝破产了，挤在当铺前企求一线生机的王阿大们的希望破灭了，日趋赤贫化的中国农民的购买力也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势下，以农民为重要销售对象的林老板本事再大，最终也只能落得个关门倒闭的命运。

1930年春，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曾有意地意识到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整体认识，从而产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并着手构思《子夜》的创作大纲。后来，他把“写一部农村与城市的‘交响曲’”的计划压缩了，只集中写都市生活，而把他所熟悉与积累起来的农村与乡镇的生活素材，先后提炼创作了《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当铺前》等短篇。可以说，这些短篇的构思与创作，是建立在作家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整体认识的基础上的，因而他才能挥洒自如地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描写，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